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1 年第 4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1 年 9 月 5 日

编者按

1. 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张芬 何艳
2. 理解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郭水文 肖文静
3.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张光南 周华仙 陈广汉
4. 环境管制与中国能源效率.....王兵 张技辉 张华
5. 中国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樊士德
6. 中国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张原
7.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不平等.....邓旋
8.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性研究.....刘小勇 丁焕峰
9. 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张川川
10. 发展农村金融打破“三农”经济收入增长的陷阱.....赵振宗
11. 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数量演进.....杨正东 甘德安
12. 中国出口为何如此“脆弱”.....项松林
13. CAFTA 建立后 FDI 能替代进口贸易吗.....颜银根 安虎森
14.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测算与行业差异分析.....高敬峰
15. 控制通货膨胀与中国汇率制度的走向.....刘思跃 叶莘
16. 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张卫国
17. 国外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展评述.....邵传林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 1000—1500 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

张芬（武汉大学）、何艳（湖北工业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健康与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一个更为健康、受过更高教育的个体所具有的生产率水平也更高。但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教育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一直为人们所强调和重视，而健康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被忽视。

作为形成人力资本的两种不同方式，健康和教育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就替代关系而言，无论是健康投资抑或人力资本投资都需要耗费个体或家庭有限的资源，因而两者是此消彼长的权衡取舍问题。就互补关系而言，健康的体魄是其他人力资本形成的载体，健康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同时，身体健康的个体往往比健康不佳的个体的学习效率更好，因而也更能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发挥对经济增长更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尽管健康是其他人力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但如果只有健康的体魄，而没有教育人力资本与之相辅，则难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能。

由此，从微观角度而言，个体需要注重营养和对身体的保养，个体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可促进人力资本的改善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个体收入。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而言，政府要加强对公共医疗保健卫生等的投入，可以通过健康投资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涉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从贫困减弱和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于经济发展落后从而导致私人健康投入不足的地区，政府应通过公共健康支出的增加来补足。这样，通过改善落后地区发展起点上的公平，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总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此外，从政策层面而言，我们还提出了政府要重视人力资本结构的要求。政府应该从最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和激励人力资本的形成结构。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总量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的分配，应该服从能最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则。不能只重视教育投资而忽视健康投资，应视经济生活中健康和教育的相对份额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适时调整投资比重。

2. 理解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

郭水文 肖文静（中国人民大学）

《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当今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商品的丰富性以及多样化使得人们的生活日益精彩。

与此同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也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化的时代。

在网络化时代，人们的消费选择不仅受到自身偏好以及备选对象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用户的选择的影响。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总是假设，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总是在有限的资源和最大的欲望之间做出权衡选择。因此，消费者通常分配有限的收入来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网络经济学则对传统的认识做出了某种程度的矫正。

网络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市场中不同用户之间的选择能够相互影响，单个消费者的消费选择通常会受到其他的消费者的选择的影响。例如，苹果手机 iPhone 为什么能够风靡全球？潜在用户对苹果手机的外观的偏好以及苹果手机自身的品质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其他用户的选择也是影响该用户做出购买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购买 iPhone，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身边的朋友的选择的影响——通过 iPhone，这位年轻人能够更好地与身边的朋友交流情感，同时 iPhone 的社会普及度越高，为 iPhone 提供的各种美化配件以及拓展程序就越多，这进而会给这位年轻人带来更多的体验（效用）。

在网络经济学的研究者看来，在很多市场中，用户之间通过使用相互兼容的产品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网络，而用户则构成了网络的节点。例如，使用相同的办公软件 Office 的用户之间可以相互交换文件，这些用户便构成了网络；使用相同充电接口的诺基亚手机用户可以相互使用彼此的充电器，这些用户也构成了网络。一种产品给网络中的用户带来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该产品的内在价值，也取决于拥有相互兼容的产品的其他用户的人数，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网络的基本属性。

根据网络中的用户之间的连接方式的不同，网络可以分为直接的网络、间接的网络与双边的网络。直接的网络的典型例子是早期的用电话线连接的家庭电话的用户形成的网络，间接的网络的典型例子是计算机产业中相互兼容的计算机的用户形成的网络，双边的网络的典型例子是大型购物中心的入驻商家和购物者形成的网络。不同的网络中，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

在家庭电话的用户所形成的网络中，某一位用户从网络中得到的收益直接取决于他理论上能够与之通话的其他用户的总数。因此，一位潜在的用户是否决定在家里安装一部固定电话，往往会对网络的未来规模进行预期。如果将来没有多少家庭会安装电话，或者自己认识的人都没有安装电话，那么他可能会推迟自己的决策。

在使用计算机的用户所形成的网络中，某一位用户从网络中得到的收益没有直接受到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总数的影响，而是间接地受到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总数的影响，这是因为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总数决定了互补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的供给，而互补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该产品可以带给用户的效用的大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人选择了 IBM 品牌机，很多程度上是因为 IBM 机器能够运行很多软件，很多软件开发商包括当时的微软都为 IBM 品牌机提供专业的程序产品。由于互补的软件比较多，因此 IBM 的用户获得的效用也就越

大。

在大型购物中心的入驻商家和购物者所形成的网络中,入驻商家从购物中心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购物者的多少或者说客流量,而购物者从购物中心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入驻商家的数量多少。知名运动品牌耐克的专卖店都会入驻繁华地带的大型购物中心,因为那里的客流量很大;同时北京的西单商场往往成为购物者的天堂,因为那里有各种品牌的商品可供选择。对于大型购物中心来说,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台,努力撮合双边的用户之间达成交易,并从中收取中介费用。

互联网、3G 通信网、物联网……各种网络技术逐渐进入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正如夏皮罗和瓦里安两位网络经济学学者在《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所说的:“技术会改变,经济规律不会变。”面对网络化时代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现象,理解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是认识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所必修的一堂基础课。

中国经济研究

3.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

张光南 周华仙 陈广汉（中山大学）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基于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9.9%，比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幅高4.2个百分点。最近中央政府也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措施，在《4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测算》中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占37.5%，共约15000亿元。地方政府也将基础设施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广东“刺激经济十六条”措施中，加快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措施列在首位，其年度安排投资资金达1760亿元。那么，如何分析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衡量各项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存在最优的投资次序？

研究政府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具有较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但问题是如何定义“最优”，其衡量标准是什么？许多文献基于“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标准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世界银行研究发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投资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中高收入国家的电信和能源投资比例较高，但低收入国家则水供应和医疗卫生支出倾向较高，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次序与国家生产结构转变紧密结合。事实上，中国在1978-1989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起步阶段也优先建设其中的部分重点行业，如“能源、基础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计划总投资2927亿元，占全部重点建设项目的94.2%。那么，现阶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财政预算约束条件下，除了考虑投资规模之外如何决定基础设施项目的最优投资次序？

我们基于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与最优规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及政府总投资占GDP比重均低于最优规模。1996-2008年各项实际投资规模年均值分别为3.25%、2.86%、3.00%和11.60%，均低于最优规模4.7%、3.3%、5.0%和21.0%，表明中国各项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仍然不足，而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最优规模的差距尤为显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项基础设施实际投资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最为接近最优规模，2001年甚至出现实际投资超过最优规模的过度投资问题，这是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要致富，先修路”，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发现：中国道路建设投资每增加人民币10000元，能够使3.2个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均道路里程每增加1%，家庭消费将增长0.08%。为此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推动“交通扶贫”，以促进欠发达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这使交通建设相对其他基础设施投资而言较为充足。

中国各项基础设施及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值都大于 1，表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其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和“政府总投资”，均显著高于世界各国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此外，中国政府总投资的最优规模 20.95% 低于世界各国的最优规模 23%，这表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低于本国的最优水平，也低于世界水平。

在当前中国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并出台《4 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测算》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和最优投资规模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能进一步得出最优投资次序的政策建议：从政府投资的收益角度看，由于各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分别为“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使得政府投资收益最大化则可按此顺序优先次序投资；而从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和紧迫程度而言，则应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实际投资与最优规模的差距由大到小顺序，即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次序投资。

4. 环境管制与中国能源效率

王兵 张技辉 张华（暨南大学）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 4 期

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公布，2010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5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6%。中国也因此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其中，原油进口 2.39 亿吨，同比增长 17.5% 左右，对外依存度更是接近 55%，石油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在我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能源需求也出现高速增长。虽然我国能耗强度进一步降低，但仍是美国的 3 倍、日本的 5 倍。

能源资源的使用绩效状况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能源效率和生产率问题都是中外学者研究能源经济的焦点。中国当前的能源经济问题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其二，环境恶化所导致的气候灾难也不断增多。这种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使得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反，能源使用绩效的提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由于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在能源使用绩效提高的情况下能源消费的减少则会减少污染；第二，对于维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因此，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是我国应对当前严峻的能源、环境形势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于我国近些年经济发展过热，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快速增长，大批淘汰的落后产能屡禁不止并不断扩张，导致考虑了环境因素的我国能源效率从 1998 年到 2006 年持续下滑。

“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在国家相关环境管制政策严格执行下，2007年环境能源效率值略有回升，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1998-2007年的平均水平来看，在资本和劳动投入给定的情况下，中国平均每年可以分别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和增加产出15.77%。

另外，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高于中部地区，西部最差。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效率虽然整体上也是下降态势，但在2007年出现回转，这和国家整体趋势一致，说明中央“十一五”规划中对污染和能耗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但西部地区情况却未好转，在2005年以后仍处于下降趋势。因此，应当在西部地区进一步强化落实中央“十一五”规划中的能源环境政策。而且，在下降的幅度上，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特点。

能源效率的差距不仅体现在东中西部之间，省份间的能源效率差距也很显著。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海南和广东六省的能源效率最高，贵州能源效率最低，前者约为后者的1倍。而且，这种省份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因此，加强区域间的学习和交流，让技术在国家内部扩散，让高效地区带动低效地区的效率提高不仅可以增加GDP产出，还可以减少能源投入和污染排放。除此之外，引进外资、提高其工业化质量、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改变我国刚性的能源消费结构、结合我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制定适宜我国当前经济现状的路线、提高人均GDP等等都可以进一步改善能源效率。

但是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在市场经济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现状下，能源管制和垄断，使得能源要素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市场的需求，最终导致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不能提高能效。其二，环境管制不仅需要投入成本，也会减少GDP产出。企业能否适应环境管制的要求，取决于企业减排的技术成本。若减排的技术成本对企业来说很高，强制推行环境管制政策就会导致能源效率的下降。当前，东部地区的企业能够承受环境管制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在目前技术水平下、在不阻碍能源效率的情况下还无力承担环境管制的压力。

5. 中国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吗？

樊士德（南京大学）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政策取向。

收入差距目前已上升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政策倾斜、中心-外围论、累积循环假说等。笔者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切入，考察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给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大规模、高增长与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的状态并存，与此同时，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甚至仍有不断恶化趋势，这一经验事实构成了本文构思的逻

辑出发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流动是缩小还是拉大了差距？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是否具有解释力？

西方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带来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收敛。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会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笔者在对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理论层面无论是将外流劳动力归入欠发达还是发达地区进行考察，单纯的劳动力流动并未熨平收入差距，反倒拉大了差距。这与国内现有研究以及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形成了典型的“悖论”。

究其原因，其一，我国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扭曲式的流动，而非真正的市场化自由流动等，进而没有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因而西方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并不具备解释力。其二，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与根深蒂固的排斥倾向，造成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优质劳动力被发达地区和城镇“筛选”后吸收，而大部分则呈现候鸟式和钟摆式流动，与此同时，其他要素如资本和技术等也随之外流，无形之中人为地更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条件的显著差距，进而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三，中国长期以来宏观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发达地区指向，城乡与地区间的分配格局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为不平等。大部分候鸟式的外流劳动力只获取微薄的工资性收入，福利并未得到改善，即使假定收入有一定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或临时性，而非弗里德曼所提的永久性收入，由此，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而呈现拉大态势；其四，欠发达地区一味输出劳动力的发展思路，而不从自身的内涵式发展寻求跟进、超越和突破，很难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而上述提及的优质劳动力外流又恰恰弱化了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家庭其他的收入渠道和创收能力，最终使差距趋于拉大。

由此可见，单纯依靠劳动力流动，并不能带来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差距。为了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还需另辟蹊径，多管齐下：如形成以就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尤其偏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纠正以往的错位与缺失；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和刺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效率；发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同效应；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注重改善外流劳动力的基本保障与福利状况，大力推进城乡社会福利的统筹考量与公共福利均等化等。

6. 中国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

张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行业垄断已经成为加剧我国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要原因。为此，笔者构建新的垄断-竞争两部门利润分享模型，揭示行业垄断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我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行业垄断在产

品与要素市场中,通过最终产品消费的福利转移、要素的区别定价以及垄断利润在不同就业者之间的非均衡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行业垄断力量对经济干预较多的阶段,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较为严重,并且往往表现为劳动总收入的下降。因此,持续提升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必须配合行之有效的行政垄断部门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降低行业垄断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影响。

具体而言,政策措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扩大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反垄断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反垄断立法和具体实施进程,确保垄断规制有法可依,同时加快产权改革进程,降低行政力量对生产和消费的干预,削弱行业垄断存在的制度基础。其次,规范垄断行业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听证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垄断行业对市场利润的不合理截取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第三,随着垄断行业改革的推进,行业内原有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再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必然要求建立新的劳动报酬机制,其工资形成机制应该从主要依靠政府调节向劳资双方面对面处理为主的方式转变,依据就业者能力和“同工同酬”原则设计工资制度。第四,规范垄断行业内部的非工资性收入分配制度,防止由于福利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采取最低工资立法等措施维护低收入行业的劳动者权益,建立竞争行业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促进不同行业间劳动报酬的协调发展。

7.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邓旋(武汉理工大学),《经济评论》第4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新世纪之初就已经越过了收入差距国际警戒线。近些年来社会公平问题逐步上升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日趋严重。基于上述背景,笔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采用中国1995-2009年省级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及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即从机制上探讨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作用机制。

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两个层面切入,可以探讨财政支出总量以及各种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的财政支出项目对于城乡居民之间的绝对与相对收入不平等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笔者以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来建立模型,而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考虑财政教育支出、农村地区支农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等四种类型;在财政支出结构的度量方面,分别考虑了社会文教支出、农林水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这四种基本支出形式。经过对数据和指标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财政支出偏向城市的分配方式,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社会文教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林水务支出缩小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而由于农村居民较

少地享受了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使得农村居民垫付了更多的公共成本,该两项支出扩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研究表明:由于长期实施财政支出“城市偏向”分配机制,财政支出显著地扩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而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互异,其中农林水务支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间相对收入差距,而公共安全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受益范围主要局限于城市,显著不利于城乡间收入状况的改善。其政策含义是:要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必须转变财政支出“市民导向”的既定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文教以及农林水务支出,扩大公共安全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在农村的覆盖率。

8.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性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刘小勇 丁焕峰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性是经济增长收敛的延伸。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收敛,区域间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趋同,那么,根源于人均收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自然也会存在趋同。蒂布特“以足投票”理论认为区域间公共产品和服务存在发散。在“以足投票”机制下,居民会通过迁徙来选择适合自己偏好的税收——公共产品和服务组合,从而形成不同的财政辖区,各个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基本一致,而辖区间居民偏好则相差较大,税收——公共产品和服务组合在辖区间将存在较大差异,人口迁移加剧了财政辖区间居民偏好的发散,也容易导致财政的两极分化。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有五大影响因素:第一,供给因素。政府供给能力是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地方财政收入越多,其就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公共卫生服务中,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一般会增加地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第二,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反映了公共产品供给会受政府财力制约,但是,除了财力制约之外,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还会受到需求方的影响,会受居民的偏好水平的影响。在民主社会里,公共产品需求反应的是居民的偏好,需求机制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最重要机制。瓦格纳法则也蕴含着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卫生等收入弹性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增加。第三,转移支付机制。地方政府财力中除了自有财力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中央的转移支付有大部分是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因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会影响当地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第四,竞争示范机制或溢出效应机制。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也会受到相邻地方政府供给水平的影响。如果地方政府更多面临辖区居民的压力,可能会根据相邻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来调整本地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水平。第五,路径依赖。人们的行为选择会受过去行为的影响,同理,政府供给卫生公共服务水平也会受过去水平的影响,这称之为路径依赖。尤其是在中国,预算编制上受过去增量预算的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仍然存在增量供给的影响,政府在过去预算支出水平上,通过确定一个增长比例来确定本年度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所以,从这方面讲,中国公共卫生服

务供给的路径依赖可能较强。

基于上述原因,选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来考察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的研究发现:第一,区域公共卫生服务存在收敛现象。当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时候,区域公共卫生收敛速度为17.2%,当考虑空间因素的时候,由于空间效应为负,收敛速度下降为12%左右。第二,区域间空间效应为负。一方面,地区间在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上存在趋坏竞争。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服务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由于本地居民会受益于其他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本地区供给会降低。第三,公共卫生服务既受供给因素的影响,也受需求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提高1%,人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会增加11%左右;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提高1%,会增加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11%左右,这表明,如果地区间财力差距不缩小的话,那么区域间公共卫生服务会存在发散。第四,政府转移支付有利于缩小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人均转移支付增加1%,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增加20%左右。

为此,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确保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另外,落实科学发展观,淡化GDP万能思路,建立更加科学的长效激励机制,避免地方政府追逐短期GDP增长,忽视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地区间良性竞争、趋好竞争,避免趋坏逐底竞争。

9.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张川川(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居民健康程度的提高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健康的好坏与包括教育、劳动供给、收入等在内的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密切相关。著名经济学家格罗斯曼(Grossman)于1972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将健康视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如果将健康看作是人力资本,认为健康的改善(恶化)会增大(减小)劳动供给和收入就是合理的。健康的人身体能够适应劳动,也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劳动中,会有更高的收入。

尽管基于格罗斯曼(Grossman)的研究可以在经济理论上看到健康会影响劳动供给和收入,但理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经验检验,这就需要求助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经济学和卫生领域的研究表明,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确实呈现“梯度”特征,即好的社会经济状况总是与好的健康相关联。但是计量经济学技术的进步对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挑战: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是一种因果联系?例如,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在成长期就会有包括饮食和居住环境在内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有更好的健康,又由于父母给予其更多的馈赠,从而有较高的收入,这样一来健康越好收入就越高,但事实是,高的收入并不是由于健康好,两者都源于此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计量分析中,“富裕的家庭环境”属于同时影响健康和收入的第三方因素(common factor)。此外,另一种导致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发生混淆的可能来自于所谓“双向因果”,即SES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可能是由于好的健康导致了更高的SES,也可能是较高的SES导致了

更好的健康。正确识别健康与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理论上,只有依赖正确可靠的经验证据才能对经济理论的好坏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实践上,经验证据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例如,如果健康确实影响到劳动供给和收入,在不考虑这一点的情况下,就会低估增进公民健康的政策的效果和价值。

目前,国外文献在对健康和收入因果关系的识别上主要依赖工具变量法,即需找一些只通过影响健康来影响某些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或者仅通过影响某些社会经济状况来影响健康的变量。但是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需要很大的样本量。尽管关于 SES 和健康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但在因果关系的识别上仍然还很初步。在国内,尽管不断增长的收入水平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加大的生活竞争压力都引起了人们对健康问题更多的关注,在文献上还很少有研究同时关注健康和 SES。据笔者所知,仅有齐良书、封进、李宏彬等利用中国数据同时考察过健康和 SES 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各自检验了收入、收入不平等同居民自评健康的关系,发现居民收入水平与自评健康存在递减的正相关关系,而收入不平等和相对收入差距等则对健康有非线性的负影响。他们并没有重点考察收入、劳动供给等社会经济变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强调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识别。然而,除了 SES 对健康的影响以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健康如何影响 SES。健康的身体是确保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健康恶化很可能导致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减少,正确识别健康对 SES 的影响对于正确评估旨在增进公民健康的政策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借鉴著名健康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的相关研究,笔者在控制基期健康和 SES 状况的基础上,利用 CHNS 数据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对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因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恶化导致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显著降低。此外,健康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城乡居民和两性之间均存在差异,健康对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在农村样本和男性样本中效果更大更显著,且健康恶化对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在农村样本和女性样本中均存在滞后性。具体而言,城市居民和男性更容易对健康恶化做出反应,而农村居民和女性不容易因健康恶化退出劳动供给;相反地,健康改善则对农村居民和女性劳动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旨在增进公民健康的政策还有助于间接地对劳动供给和收入产生正的影响,具有“溢出”效应;在评估健康干预政策时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对男性和女性要区别对待。

10. 发展农村金融打破“三农”经济收入增长的陷阱

赵振宗(海南大学)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中国的 GDP 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依然改变不了我国是世界农业人口大国的现实,全国 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但是随着传统农业的发展,农业产出已经达到极限状态,农民的收入增长出现了相对的稳中有降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问题历来

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和市场手段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来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村金融产权供给,是当前政府应该迫切关注的问题。

中国农村金融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现实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模式被打破之后的尴尬:一是相对于社会分工,农村的社会化分工程度低,尤其在边缘的贫困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农民从没有摆脱过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农村金融制度供给模式,尤其是扶贫模式的尴尬,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扶贫模式,不仅破坏了农村金融秩序,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而且导致农村基层权力阶层的寻租腐败。另一方面是农村金融研究方法上的尴尬:一是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从事农村金融,尤其是扶贫的工作者来自于社会学领域,由于缺乏对金融领域知识的认识,片面侧重于制度供给,强调增加对农村的金融制度投入,而忽视了这些制度发生作用的条件,因此收获甚微;二是主流金融学强调资金的使用效率,止步于农村金融的高成本,片面强调农村金融的信息不对称,过分强调农村金融风险,缺少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的信用认识,导致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中无所作为。

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的金融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离不开引导农民自觉地参与。由于社会学者缺乏金融领域的相关知识,采用的往往是以专家成果为导向的传统的外部经验、模式的供给推动(supply push)为主,缺少对金融需求的经济学认识。金融学为农村市场研究提供了可供计量的实证分析依据。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本地化、差异性、学习型的机制和发展、学科交叉、参与式、行动性的社会研究提供了解决途径。发展农村金融必须将社会学知识和金融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商业小额信贷以及其他农村金融服务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应该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如何正确定位这些金融活动?是金融学和社会学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金融学可以实现资源的更好配置,但是离开了社会的金融学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过分强调金融的作用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而不能立足农村现实,其结果只能是产生更多的无效供给和社会资源浪费。社会学关于社会行为、社会思想和社会感受的认识是发展农村金融,引导农民自觉参与的重要价值判断标准和工作方向。将扶贫作为攻坚战,而忽视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真实需求,一味强调金融和支付转移式的扶贫,根本无法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目的。

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发挥其在农村调研和统计分析方面的优势,通过实地参与社区层次扶贫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实施、管理、监测评估的方式,逐步探索农村金融顽疾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突破金融学在农村金融研究和农村金融发展上的瓶颈。并以数量分析为基础,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农村金融评价体系,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依据。

11. 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数量演进——基于种群生态学的仿真实验

杨正东(北京工业大学)、甘德安(江汉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有关市场化的利弊也成为我国学

术界争论的焦点,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国家四万亿的投资大多数如强针剂般地注入国有部门,让“国有化”卷土重来的呼声再度响起。国内学者如卫兴华和张福军(2010)、项启源(2011)都认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批评、指责或赞同都是多余的。但反对之声显然更为强烈。王文龙和金丽馥(2010)认为当前蔓延的“国进民退”现象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就业、分配、产业结构失衡与机会不均等问题,使民主与法制倒退,最终有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夭折。张寒松(2010)对此争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张曙光认为,“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许小年认为,“国进民退”背离改革方向;茅于軾、周瑞金、胡星斗、赵晓、盛洪、张鸣、保育钧、胡德平和任志强等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都对“国进民退”现象持批评意见。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自身经济制度的前提安排,赞成国有化的声音一直显得非常羸弱,这主要集中体现于 Grossman(1986)和 Shleifer(1996)对国有资本效率不佳的经典论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94-2000年间私营企业的数量急剧增长,利用了社会资源,创造了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明显的“国退民进”过程。而2002年以后增长速度变慢,之后的2003年、2004年是一个分界线,从那时开始出现了“国进民退”。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更加表明“国进民退”分水岭的产生。当年的7月10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召开了首次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196家中央企业负责人悉数到场,李荣融对他们的要求掷地有声:“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时至今日,又经过了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环境的恶化,我们不能不感慨中国民营经济的坚韧和顽强。

这种坚韧与顽强是民营企业任何经济体制中都具有普遍存在性的体现,那是因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已经表明了生产技术随产出波动而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导致了民营企业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正如企业契约对市场契约的替代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一样,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从而使心理契约成本较低;企业网络组织理论也证明发现东亚企业普遍有着“弱组织,强网络”的特点使得家族企业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是两个优势互补的经济组织安排。认清了这一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按两种经济组织的特有秉性,调动资源,把这两种经济组织的优势在一个平衡的点上发挥出它们各自最大的经济能量。

所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为两种种群在市场经济中应该竞争并存——这种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并与民营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环境中,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坚守自己的经济领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国有企业发挥实力,民营企业体现活力,才能释放强大的经济动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在这场群雄逐鹿的竞争中,有时民营企业在面对强大的国有企业竞争时会出现不战而败的乱象。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出一幅“国进民退”的新局面。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主要是金融、能源、军工、交通运输、通讯、钢铁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实行国家政策性倾斜。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停滞。表面上，民营企业是直接的输家，消费者是间接的输家。但实际上，政府部门如果再次遭遇“政企不分”的老毛病，花费很大精力提高的企业竞争效率难免退减，最后国家自身可能是最大的输家。

12. 中国出口为何如此“脆弱”？

项松林（南京大学）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历了出口的持续繁荣。1991-1999年，出口以年均23.1%的速度增长，是同期世界总出口增长速度的3.7倍。进入新世纪后，2000-2007年的年均出口增长速度更是高达24.8%。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大幅减少，2009年的出口额比2008年下降了18.3%，暴露了出口贸易抗击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理解我国出口波动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微观结构上考察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使用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或地区的6位码贸易数据，可以将所有出口产品划分为三类：老产品、新产品、消失产品。1995-2009年，我国以老产品和新产品方式出口的产品种类占总出口的43.3%和56.7%，但老产品的出口产值占总出口的83.3%，而新产品仅占16.7%，老产品对我国出口增长的作用远大于新产品。与1995年相比，中国每年大约有23.0%的产品会从出口市场中退出，但这些消失产品的价值只占总出口的1.7%，消失产品对我国稳定出口增长的作用有限。

虽然老产品和新产品共同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但它们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对稳定出口的作用不同。以老产品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不仅会给进口国造成“倾销”的假象、导致涉华贸易摩擦增加，而且也极易遭受外部冲击、导致出口的大幅波动。相反，如果中国的出口能实现以大量新产品向大多数国家出口，那将增加贸易品的种类而不仅是贸易量，既有利于中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又有利于面临外部冲击时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

为什么中国会长期存在以少数老产品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而难以提高新产品在出口增长中的比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企业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如果不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将会存在不少的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然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使得一些生产率不符合出口条件的老企业也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能继续在出口市场中生存下来，老产品的出口随之扩张。同时，老产品的成本优势又降低了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动力，妨碍了潜在生产者进行产品创新的利润预期，新产品研发速度下降和出口扩张缓慢。因此，对于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国家来说，增长以老产品的出口扩张将是一种常态，也是出口导向型发展

模式的必然选择。

老产品的出口扩张并未说明转型国家出口产品不存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既可以体现在新产品中,也可以体现在老产品中。如果将新产品的技术进步类比作实验室创新,老产品的技术进步则更多地体现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的偏向创新。虽然偏向创新可以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但难以生产出一种全新的、能引领世界消费潮流的新产品。企业无论是从事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专注于偏向技术创新的产品出口难以在根本上改变出口贸易的波动发展。

另外,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也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稳定性。随着中国的贸易份额逐渐做大而世界经济并未做强,涉华贸易摩擦不断深化。即使我国不断重申人民币汇率并非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但以克鲁格曼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美国再工业化”和美联储接连的“量化宽松政策”仍是威胁中国稳定出口增长的重要外部原因。

面对日益复杂的外贸环境和老产品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为实现中国出口的稳定发展,既需要进行内部化改革以便寻求发达国家的对等让步,也需要在未来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下完善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实现新产品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确保出口的稳定发展。

13.CAFTA 建立后 FDI 能替代进口贸易吗?

颜银根 安虎森(南开大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FDI 流入能替代进口贸易吗?——基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 4 期

经过十年的筹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这一区域内人口数量最多,未来发展前景也被普遍看好。2010 年中国与东盟区域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 13%,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取得了飞跃。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2008 年,中国进口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金额分别为 11325.6 亿美元和 8526.13 亿美元,是 1983 年的 104 倍和 930.8 倍。中国进口贸易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进口贸易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后拉开帷幕,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国的进口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有着更强的偏好,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以及山东等沿海省份。据不完全统计,在 1998-2001 年期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 90%流入到沿海城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随着关税税率的进一步下降,我们可以预期区域内的贸易可能不断增加,但是如果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中国有

着娴熟的技术工人,有着相对完善的市场体制,可以预见未来将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以及东盟其他国家。对于东盟内部一些国家的企业而言,他们同样有可能直接到中国大陆投资。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投资可以直接为中国消费者以及厂商提供更加便利的消费品以及中间产品;另一方面,进口关税税率的降低使这些厂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对中国出口。那么,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到底对中国的进口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会促进中国的进口,也有可能减少中国的进口。而这主要取决于区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水平、中国的劳动力数量等因素,甚至同东盟十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水平息息相关。这里我们所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除了与关税税率相关之外,与地区或者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也是有关的。从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国-东盟内部的整体贸易自由化水平高到一定水平,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才会减少进口贸易。否则,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促进中国进口贸易额增加。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否会减少进口贸易与这些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同第三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有关。与第三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外商之间投资流入越有可能促进进口贸易的增加。

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进口贸易更有可能增加,地区的资本量对进口贸易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人民币的升值促进了中国进口贸易的增加。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会降低中国的进口贸易。但是如果能够同时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化水平,则完全可以促进中国进口贸易,FDI的流入将与进口贸易成为互补关系,从而有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14.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测算与行业差异分析

高敬峰(山东经济学院),《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从“芭比”娃娃到“苹果”手机,有关中国贸易顺差“真相”和贸易利益大小的讨论正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芬斯特拉(Feenstra, 1998)的经典案例表明,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大约10美元,而其中只有0.35美元是中国的劳动力加工报酬;最近投向市场的苹果公司手机iPhone也是“中国制造”,但其中只有3.6%的价值来自中国。获取贸易利益是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力,我国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贸易规模庞大,所获取的贸易利益状况如何呢?

通过借鉴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 2007)关于出口技术含量的度量方法,构建出口收入份额指标,选取出口额排在50位的国家和地区,计算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和各国在其中的相对份额发现,中国外贸出口的相对贸易利益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2001年,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为11738;2009年,该指数上升到17090,年平均增长率为4.81%,这意味着世界出口平均技术水平在此期间是逐渐提高的。中国在其中的相对份额排名从2001年的

第40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37位, 相对份额从2001年的0.18%上升到2009年的0.43%, 每年平均上升大约0.03个百分点。

不过, 中国所获取的贸易利益与发达国家相比, 有着很大的差距。例如, 美国的相对贸易利益份额在2001年时曾高达7.37%, 高出中国7.19个百分点; 此后虽不断下降, 但到2009年时仍为4.94%, 远高于平均数, 高出中国4.51个百分点。

从分行业状况看, 按照2009年数据排序, 出口收入份额排在前五位行业依次是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在相应行业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中的份额依次为2.42%、1.92%、1.79%、1.63%、1.31%, 其中纺织业是唯一超过平均数2%的行业。中国这些行业出口额在世界相应行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都非常高, 但是这些行业的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却相对较低, 其中, 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是制造业中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最低的两个行业。

出口收入份额按照2009年数据排序, 排在后五位行业依次是烟草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在相应行业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的份额依次为0.04%、0.06%、0.08%、0.09%、0.11%。中国这些行业出口额在世界相应行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相对较低, 不过这些行业的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却相对较高, 其中, 医药制造业是制造业中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最高的行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能够获得较高贸易利益的行业, 集中在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相对较低的行业, 依靠的是在世界市场中较高的出口份额。在世界出口收入指数相对较高的行业, 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出口份额较小, 获得的贸易利益也相对较小。从这一角度而言, 中国主要在低技术行业依靠出口规模而获取贸易利益, 在高技术行业, 中国获得的市场份额和贸易利益都很少。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企业大多以代工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 只能赚取很低代工费的现实情况。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制造业在低技术行业依靠大规模出口以获取贸易利益的现象更为明显。从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这两个制造业中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最低的行业看, 中国纺织业出口以32.56%的世界市场份额仅享有2.42%的出口收入份额,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口以31.61%的世界市场份额仅享有1.92%的出口收入份额。相比之下, 意大利纺织业出口以5.20%的世界市场份额却享有9.52%的出口收入份额,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口以6.89%的世界市场份额享有11.94%的出口收入份额。中国明显处于这两个行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获取的贸易利益较少。

目前我国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仍在于较低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 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 因而在贸易地位有所提升的情况下, 我国的贸易利得却没有明显增加。中国欲摆脱以代工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而赚取低廉代工费的现实处境, 需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依靠较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的要素禀赋状况, 致力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 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而形成以技术为主导的竞

争优势。

15. 控制通货膨胀与中国汇率制度的走向

刘思跃（武汉大学）、叶革（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

《不同汇率制度下汇率传递时滞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四国数据》，《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近几年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7年5月18日中央银行宣布，自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pm 0.3\%$ 扩大至 $\pm 0.5\%$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011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又一次迎来汇制改革以来的“新高”。人们关注最多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恰当与否、对国内经济影响如何以及人民币汇率会有怎样的变动趋势。

汇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汇率政策和与之相关的宏观政策的配套实施，实现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汇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一路高歌。截止2011年7月21日，人民币累计升值28.15%。人民币持续升值不仅没有抑制通货膨胀，甚至加剧了通货膨胀。

原因有二：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已经通过汇率这一关键因素，传递到我国国内物价上来了。短期内， $\pm 0.5\%$ 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难以抵消国际商品价格上升幅度，直接导致用人民币计价的国内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促使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不足以抵御国际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市场上形成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刚性”预期，从而造成大量的热钱涌入，这些热钱直接进入虚拟经济体中，助推了股市、房地产等领域的泡沫产生，逐渐演变成国内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抑制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而汇率是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汇率越趋向稳定，对物价水平的冲击作用滞后期越长。即在汇率弹性较小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本身对国内物价水平反应不及时。相反，汇率越是趋向浮动，对物价水平的冲击作用越迅速。在汇率的弹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将会立即反应到物价水平的变动上面，货币当局也才能灵活运用汇率工具来影响物价波动，进而有效地平抑通货膨胀。

从预期理论角度上看，如果汇率波动方式不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升高的汇率仍可能保持下去，而不会下降。因而，持续的单边汇率升值预期将使得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导致流动性泛滥，国内物价上涨。所以，较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升值预期，抑制热钱的涌入，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坚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是必要的。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预期，将有助于控制我国通货膨胀。实现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未来走向。

理论前沿动态

16. 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张卫国（山东大学）

《语言的经济分析：一个综述》，《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边缘交叉学科。它主要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

作为一个术语，语言经济学来自信息经济学开拓者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的一篇同名短文。作为一个时代产物，语言经济学孕育于民族主义问题之中，发端于加拿大的官方语言问题。而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它成就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1965年马尔萨克在考察语言信号传递效率问题时，从语言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引出了对语言的成本、收益、价值和效用等经济特性的讨论。马尔萨克的思想得到了随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在此后的30多年间，二者结合起来一道催生出了语言经济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语言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一方面，语言经济学为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带来新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正在为经济学自身提供新的研究话题。

语言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语言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及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狭义上，语言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语言动态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博弈论在语言学中的应用等构成了当前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来区分。理论层次上，语言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与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交叉与融合，或用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来分析语言的产生、发展及变迁等，或研究语言及言语行为对经济行为影响和作用的机理；应用层次上，语言经济学着重研究语言经济学理论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指导、实践及应用，研究解决社会现实中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种种经济或社会问题，如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语言与经济发展等。而在研究方法上，语言经济学主要采取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前提假设和论证过程。

在跨学科取向方面，语言经济学横跨了经济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尤与（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关系紧密。语言哲学关注概念思辨，可以为语言经济学提供一定的哲学基础或方法论的指导，经济学家也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证实或证伪某些哲学方法论。对于某些特定问题，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沿着各自的思维方式展开的，经济学家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也极有可能拓宽（语言）哲学的研究思路。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则为揭示社会语言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语

言经济学可以在借鉴社会语言学已有的成果基础上为社会语言学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也可以带来新的分析工具,和社会语言学形成互补与协作关系。

17. 国外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展评述

邵传林 (兰州商学院)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 国外文献评述》,《经济评论》2011 年第 4 期

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非正式融资制度安排,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同时也广泛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外经济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侧重于探讨该制度形式兴起的经济学逻辑、运作效率及其内在缺陷等问题,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从农户的视角对国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及其经济绩效进行总结,并对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境况做出评判,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三农”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还能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尽管国外经济学界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文献在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形成机理、影响非正规金融发生的现实诱因、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间的关系、非正规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测度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仍在某些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尤其是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发逻辑、内在机理、规模与功能测度等方面。具体来讲,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相互竞争、相互依赖、共生生存;第二,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如信贷分层机制、贸易信贷、关联性交易;第三,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社区文化及村庄信任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第四,政府要想有效地干预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要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农户的信贷需求;第五,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非常有限。

显然,已有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证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效率上,并没有思考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问题,也未考虑如何构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机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的研究也主要是抽象理论模型的构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分析;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缺乏定量研究,并没有测度出在何种情况下二者发生替代关系,何时发生互补关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农户、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没有弄明白“金融监管悖论”问题的制度背景;较少有文献从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如何演化生成的。此外,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建立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大多数实

证研究的文献仅对常识性论点进行证实, 缺乏思想深度, 较少有文献测度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农户民间融资额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计量出非正规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考察该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